

一部记录洛阳古代音乐文化史迹的文献

洛阳古代
音乐文化
史迹

孙敏
王丽芬 著



化史迹

1

署
()

文物出版社

洛阳古代音乐文化史迹

孙 敏 王丽芬 著

文物出版社

封面设计：橙子设计艺术会所 周小玮

图片摄影：周立高虎

责任印制：陈杰

责任编辑：王霞李睿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洛阳古代音乐文化史迹/孙敏, 王丽芬著. -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4.5

ISBN 7-5010-1407-8

I. 洛… II. ①孙…②王… III. 音乐史-研究-
洛阳市-古代 IV. J60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1313 号

洛阳古代音乐文化史迹

孙敏 王丽芬 著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五四大街 29 号)

http: //www. wenwu. com

E-mail: web@wenwu. com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5 月第一版 2004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850×1168 大 32 开 印张: 10

ISBN 7-5010-1407-8/K·653 定价: 26.00 元

责任编辑：王 霞 李 睿

图片摄影：周 立 高 虎

责任印制：陈 杰

封面设计：橙子设计艺术会所
周小玮

前 言

洛阳位于古代中国的腹心，“居天下之中”。以洛阳为中心的黄河、洛水地区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源，也是传统文化资源荟萃之地。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自夏代起曾有13个王朝在此建都，千余年间洛阳一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洛阳文化在世代连续传递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容纳和增添新因素的过程中，形成了极其深厚的积淀。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和历史文明为洛阳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洛阳现今保留下来的传统文化遗存不仅种类繁多、引人入胜，而且时代蝉联、美不胜收，犹如一颗颗明珠折射出每个时期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光华。

人类的劳动是依照美的规律来造型的。洛阳历史文化遗存中诸多古代遗址及文物都是中华民族精神与物质的瑰宝。从艺术学的角度来审视洛阳历史文化的遗存，其有三大艺术特色。

典范性。洛阳在历史上，曾经对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在不同的时期都产生了代表时代文化最高水准的最具典范性的艺术创造。就音乐文物来看，有偃师二里头铜铃、陶埙，战国时期编钟、编磬，汉代墓室壁画伎乐图，汉唐乐舞俑，龙门石窟佛教造像的音乐图像，宋元散乐杂剧雕砖，明清戏剧舞楼……凡此种种，都

是各个时期遗留下来的表征着中国艺术传统和文化的象征物和标志物，极为典型地积淀着中华民族的艺术传统和艺术精神，是中华艺术的精华。

丰富性。主要指面广、量多、内涵丰富。洛阳历史文化遗产从音乐角度看，其乐器所谓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音”俱全，而且还保留有丰富多彩的音乐舞蹈画面和形象资料。这些古代艺术遗存本身蕴含着当时文化艺术的结构、内容和信息。一方面，它们是中国传统艺术史的璀璨结晶；另一方面，它们又对传统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连续性。自裴李岗文化起，历经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以迄宋、元、明、清各朝，每个时期的音乐文物都有出土，连续无间，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艺术宝库。

洛阳历史文化遗产的艺术内涵的典范性、丰富性和连续性，使其可以构成一个独特的艺术学研究对象。

洛阳文化是产生于洛阳地区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华夏文化的核心，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洛阳文化不同于中国其他区域性文化，在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洛阳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造就了洛阳古代音乐高起点的文化形态，创造了丰富多彩、气象万千的音乐样式，形成了具有历史传承的音乐文化系统，并以卓越的艺术成就成为各个时期音乐文化的代表和典范，在中国传统音乐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中起到了毋可

置疑的核心作用。本书试图利用丰富的洛阳历史文化遗存和文献资料，将洛阳古代音乐文化置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收集和整理，以期通过对洛阳自先秦以来音乐艺术发展脉络及其主要成就的展示，从音乐文化的角度揭示洛阳历史文化遗存博大精深的艺术内涵，发掘洛阳古代音乐文化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中的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历史作用和影响，从而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推波助澜。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夏商周时期洛阳音乐文化史迹	(1)
一、二里头夏文化遗址及其乐舞	(2)
(一) 二里头文化遗址中的早期乐器	(2)
(二) 夏代乐舞	(10)
二、商都西亳遗址及其乐舞	(16)
(一) 商都西亳遗址	(16)
(二) 商代乐舞	(18)
三、两周都邑及其乐舞	(23)
(一) 两周都邑与青铜礼乐	(23)
(二) 两周乐舞	(34)
第二章 两汉时期洛阳音乐文化史迹	(47)
一、汉代洛阳城及其音乐文物遗存	(48)
(一) 墓室壁画中的乐舞百戏	(50)
(二) 汉墓画像砖上的乐舞图	(60)
(三) 汉代乐舞百戏俑	(64)
二、洛阳两汉乐舞	(72)
(一) 汉乐府兴衰	(72)
(二) 相和歌	(76)
(三) 鼓吹乐	(80)
(四) 乐舞百戏	(83)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洛阳音乐文化史迹	(106)
一、魏晋、北魏洛阳城及其音乐文物遗存	(107)
(一) 京洛女乐与北魏乐舞陶俑	(111)
(二) 洛阳乐舞扁壶中的胡夷乐舞	(119)
(三) 洛阳北魏画像石棺伎乐图	(123)
(四) 洛阳北魏佛教石窟造像艺术中的 乐舞图像	(127)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洛阳音乐文化	(141)
(一) 音乐文化的交流	(141)
(二) 嵇康的《声无哀乐论》	(151)
第四章 隋唐时期洛阳音乐文化史迹	(157)
一、隋唐东都城及其音乐文物遗存	(158)
(一) 洛阳唐代乐舞陶俑	(160)
(二) 洛阳唐代散乐雕砖	(170)
(三) 洛阳铜镜与音乐图像	(172)
(四) 龙门石窟佛教造像艺术中的乐舞图像	(180)
二、洛阳隋唐乐舞	(192)
(一) 隋唐宫廷燕乐	(193)
(二) 隋唐民间俗乐	(205)
第五章 宋元明清时期洛阳音乐文化史迹	(216)
一、宋元时期洛阳城及其音乐文物遗存	(218)
(一) 洛阳散乐、杂剧雕砖	(219)
(二) 洛阳北宋画像石棺散乐图	(234)
(三) 宋元墓室散乐壁画	(238)
(四) 三彩瓷枕上的音乐图像	(242)

二、明清时期洛阳地方音乐及其文物遗存·····	(258)
(一) 明清时期的洛阳舞楼 ·····	(258)
(二) 明清时期洛阳地方音乐、民间音乐 ·····	(268)
附录一 洛阳音乐文物一览表·····	(282)
附录二 主要参考文献·····	(298)

第一章 夏商周时期洛阳音乐文化史迹

夏、商、周三代是古代文明从勃兴走向繁盛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音乐艺术开始形成的重要阶段。

文明时代的到来，使中国古代音乐走出蛮荒，加快了发展的步伐。这个时期，原始音乐诗、乐、舞三者结合的乐舞形式在音乐生活中依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但其社会功能却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分化。夏、商两代，随着奴隶制国家的建立和发展，乐舞从原始图腾之乐、祭祀典礼之乐、农事之乐等转向了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纪功性祭典乐舞，出现了专门供奴隶主贵族欣赏享乐的女乐。周代时建立了等级分明的礼乐制度，设置了音乐机构，创始、完备了以《六代乐舞》为主要内容的宫廷雅乐系统，完成了原始乐舞到宫廷乐舞的演化。

夏、商、周三代的乐器经历了一个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夏代出现了最早的铜铃，商代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至周代时各种乐器见诸于记载者已多达 70 余种。随着乐器品种的增加，出现了系统化的“八音”分类法；大型合奏乐队和独奏乐器逐步形成，并有突出表现；以编钟为代表的青铜乐器标志着乐器制造工艺的最高水平。

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八千年前的骨笛表现出了最早的音阶观念，至夏、商、周三代时乐律理论体系已相当完备。商代的音阶观念已经成熟。至周代，绝对音高、调性功

能、移宫换调等概念已经确立，七声音阶和十二律也已在实践中得到应用，而计算乐律的“三分损益法”的提出，则标志着音乐科学的重大进展。

夏、商、周三代乐舞的巨大成就将中国古代奴隶制音乐的发展推向了顶峰，以致被后来儒家推崇为典范，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整个封建时代的音乐文化，形成了独具风格、蔚为壮观的中华民族传统音乐。

以洛阳为核心的中原地区是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发祥地。历史悠久的河洛文化曾经历了四五十万年旧石器时代的漫长的酝酿，以及大约八千年之久的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的滋养，终于在公元前 21 世纪夏禹抵抗洪水的伟大胜利中，隆重地拉开了中国乃至世界古代文明的序幕。从此，偃师二里头夏都、尸乡沟商代都城、洛阳两周时的成周城及王城等都成为中国传统音乐形成、发展的重要历史舞台，并且在将近二千年的岁月中，创始了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光辉的开端，写就了中国音乐史上开天辟地的一章。

一、二里头夏文化遗址及其乐舞

（一）二里头文化遗址中的早期乐器

夏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政权。夏王朝的建立结束了漫长的原始社会，开始了中国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历史的新时代。它所创建的光辉灿烂的夏文化，对后世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据文献记载，夏部族原为黄帝族的后裔，河洛地区是古代夏部族活动和立国的中心。《汲冢古文》云：“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有夏一代太康、孔甲、帝皋、夏桀四位帝王先后在洛、伊之汭建都 100 余年。20 世纪 50 年代末，在今偃师西南，伊、洛二水汇流之处的二里头村发现了夏文化遗址，其时间经测定约在公元前 1900—前 1600 年之间。与文献记载的夏王朝立国的地域范围和生存年代基本相吻合。不少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就是夏都斟鄩。该遗址的发现和大规模发掘，较之同类文化遗存面积广大、堆积深厚，文化内涵亦更为丰富和典型，成为考古学上探索夏文化的主要地区，于是得名为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文化是河洛地带夏部族所创造的夏文化，也是河洛物质文化遗存在夏代的集中体现。夏代的建立不仅标志着中国古代国家的产生和文明的起源，而且使中国的原始艺术发展到奴隶制艺术的新阶段。中国传统音乐这时也掀开了新的历史篇章。尽管有关夏文化的历史和文化目前还是考古学上正在探索的一个新课题，但从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陶埙、木鼓、铜铃和石磬等一些乐器中，我们仍能够透过历史的迷雾，窥见夏代音乐艺术之一斑。

二里头陶埙 1960 年出土于偃师二里头遗址（图 1）。遗址堆积可分早、中、晚三期，陶埙出自探方 113 的第三层，属于二里头文化中期。

陶埙呈灰色，形似橄榄，通高 6.5 厘米，腹径 6.1 厘米，底径 2.0 厘米，肩部有轮制的弦纹痕迹，内部中空，底部有二次修整时的刀削痕。尖顶有吹口，口径约为 0.7—0.8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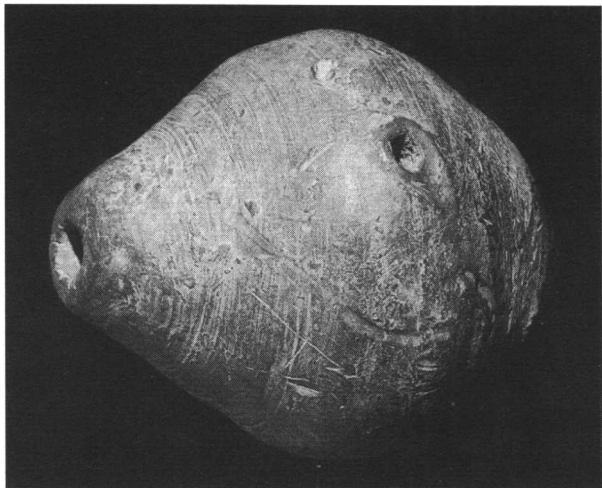


图1 偃师二里头陶埙（二里头文化）

腹部一侧有一音孔，孔径为0.4厘米，音孔似在做坯时用直棒戳出，致使孔周沿隆起。经专家测定，可发出 c^2-47 、 a^1-40 两个乐音。

埙是原始社会时出现的最流行的原始吹奏乐器。以陶土制成，一般呈椭圆形，平底，中心空，表面上有一至数个小孔，可以吹奏不同高低的乐音。最早很可能是从模仿动物鸣叫的哨子发展而来，它的按音孔不断增加，成为可以吹奏曲调的旋律乐器。这种简单的原始乐器在许多遗址中都曾发现过。河姆渡遗址陶埙有一个吹孔，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埙。河南发现的陶埙中时代最早的是仰韶文化中的2件，一件于郑州大河村遗址中出土，另一件是南召县太山乡遗址内发掘的，陶埙均为蛋圆形，其上有一音孔，可发两个音高。龙山文化中已出现了两音孔陶埙，其中尉氏县桐刘遗址出土的一件，形体如鼻烟

壶，吹口在埙顶正中，两音孔开在埙体两肩上，可以吹四个乐音，其音程分别呈五度和小三度关系，且发音准确。商代的埙多为平底卵形，但也有其他形制的。所用质料有陶、石、象牙、骨等。如郑州二里岗早商遗址陶埙呈椭圆形，有三个按音孔。安阳殷墟侯家庄 1001 号墓骨埙，埙体前后刻兽面纹，制作精美，呈橄榄形，有五个音孔。辉县琉璃阁 150 号殷墓陶埙呈平底卵形，一大二小，各开五个按音孔，可发八个连续半音，其中两个小埙可以吹出相同的音。

从目前资料来看，早期的陶埙都是橄榄形，体积较小，除一个吹孔外，仅有一至二个音孔；晚期的陶埙才呈平底卵形，体积增大，音孔增多。至商代晚期，埙的制作已趋向规格化。1964 年洛阳市机瓦厂内的 314 号西周墓内，曾出土两件相同的陶埙，均为泥质灰陶，体呈倒置的陀螺形，顶端有 1 个吹口，腹部有 5 个音孔，一面 3 个音孔呈倒品字形排列，另一面有 2 个音孔。

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的陶埙，一端有一吹孔，壁上有一音孔，仍具有较原始的形态。

陶埙是新石器时期反映先民音乐思维特征上最具代表性和发展最充分的乐器。人工乐器陶埙的制作，不仅赋予了陶土烧制器物有生命的形式，而且创造了独特的美的乐音结构。专家们对这一时期已知陶埙测音的资料分析，发现其中具有一定普遍性和典型性的三度音程结构。这些音乐史上最早的音响资料，虽然原始，但却是珍贵的先民音乐心理的真实记录。

原始社会中的“新石器时期”，是原始社会艺术思想及其审美意识倾向发展得最为明显的阶段。从新石器陶埙就已形态

化了的三度听觉尺度感，在远古四声音阶形成中已经成为支撑其整体序列结构的重要尺度和依据。陶埙制作中对三度音程的主动选择，反映了原始时期所具有的典型意义的音乐听觉思维模式和音乐形式结构的审美特征，意味着这一时期人的音乐创造能力及其审美形式感已经产生了一个重大的质的飞跃。

二里头木鼓 1981年出土于偃师二里头遗址五区第4号墓中。同墓随葬的除木鼓外，还有铜铃、镶嵌绿松石兽面铜牌、陶盂等。其时代属于二里头文化二期，距今约4000余年。出土时，鼓体已朽，仅从漆皮情况可看出其形状呈长筒形、束腰，长约54厘米，鼓外壁髹朱红漆。

鼓是原始乐器中发生最早的打击乐器。鼓的起源久远，主要发源于中原地区。有关传说和古籍记载甚丰，《世本》：“夷夷作鼓”；《帝王世纪》：“咎命倕作鞀”，“黄帝杀夔以其皮为鼓”；《礼记》：“土鼓箠桴苇籥，伊耆氏之乐也”……这些记载虽已无可稽考，但可知最古老的鼓是以土为匡、冒以生革的土鼓、陶鼓。在此之后才出现了木鼓。

山西陶寺遗址曾发现6件陶鼓，河南浍池不召寨遗址解放前也出土过类似陶鼓，其年代都属于早期龙山文化的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距今约4500—4400年。陶寺遗址发现有一例最早的木鼓，长桶形，系树干挖空制成，长约1米余，上口径约43厘米，下口径约57厘米，外壁彩绘，残留的鳄鱼骨板散落在鼓框内外，据考证当系古文献中记载的蒙有鳄鱼皮的鼉鼓。

据《诗经》、《周记》、《礼记》等大量文献记载，中原地区鼓的形制，在秦汉以前达20余种。在所出土的夏、商、周三代膜鸣鼓中，基本上包括长桶形、短桶形和细腰形三种代表形

制的“击奏鼓”和以“鼗鼓”为代表的“摇奏鼓”。这些具有中华民族特征的膜鸣类乐器，表现了当时鼓的发展和达到的水平，也表现出鼓在先秦时期的重要地位。中国鼓在原始时期即已用于音乐舞蹈之中，至夏、商、周时期，不仅用于礼仪庆典，还普遍用于劳动、祈神、祛邪驱魔、巫术、宗教、战争、役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偃师二里头木鼓是目前夏文化遗址中出土为数不多的木鼓之一。

二里头石磬 1975年出土于偃师二里头遗址第六区第3号墓的一个坑内（图2）。该坑同时出土的还有铜爵、铜戈、铜戚、圆形铜器以及玉铲、玉钺、玉戈、绿松石串珠、陶盃等。根据出土器物的形制判断，其时代当属二里头三期，距今3870年左右。

出土的石磬为青石打制而成，亦经过一定的打磨。虽然从制作上看，其打磨的程度尚欠精细，仍有一些凹面并未磨平，但从形制的设计上讲，与后世规范的石磬形制已经相当近似，磬的鼓与勾、各边角、倨勾都比较明显。经测音，此磬音高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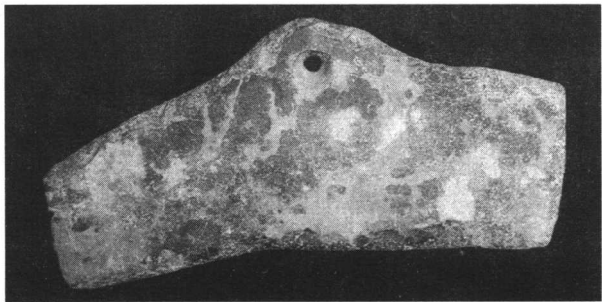


图2 偃师二里头石磬（二里头文化）